

▼ 大家学术·主编 段渝 ▼

显学中的敦煌学

项楚敦煌学论集

项楚·著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 大家学术 一

显学中的敦煌学

项楚敦煌学论集

项楚·著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Copyright © 2018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著作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显学中的敦煌学:项楚敦煌学论集 / 项楚著.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5

(大家学术)

ISBN 978-7-108-06120-1

I. ①显… II. ①项… III. ①敦煌学-文集

IV. ①K870.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238583 号

责任编辑 韩瑞华

封面设计 米兰

责任印制 黄雪明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邮 编 100010

印 刷 四川省南方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8 年 5 月第 1 版

2018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650 毫米×900 毫米 1/16 印张 15.75

字 数 182 千字

定 价 46.00 元

弁言

李学勤*

日前听闻“大家学术”丛书第一辑的编选整理已经完竣，即将付印问世，我感到非常高兴。在这套丛书的策划过程中，四川师范大学段渝教授多次垂询我的意见，我也得以从他的讲述中获知其对这套书的设想，认识到这些确实是很有学术意义的好书，值得向广大读者做一推荐。

“大家学术”丛书是在所谓“国学热”日渐升温的当口诞生的。我由于参加《中国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发 展报告》的工作，必须更多查阅学术界的资料，才发现“国学热”在不长的时间里，竟已发展到出人意料的局面。仔细想来，这本来是理所当然的，“国学”就是“中学”，亦即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部分。随着中国国势走向振兴，人们自然会增加对传统文化的关注，要求认识、继承和阐扬其中的精华，并将之推向世界。

北宋张载说：“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常被视为中国学人的最高抱负。这里面“为往圣继

* 李学勤，清华大学教授，“夏商周断代工程”首席科学家、专家组组长，中国先秦史学会理事长，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

绝学”，便可以理解为对传统文化学术的继承和发扬。前人已往，其学已绝，所以“继绝学”不能停留在前人固有的层次上，而是要于其基础上续做提高，日新又新。不过，正确地了解传统、分析传统，毕竟是继承并且创新的前提。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学术史的工作是多么重要。事实上，在历史发展中每逢重大转折的时刻，每每有富于远见的学者出现，做出学术史的总结和探究。前人曾指出，战国晚期百家争鸣接近终局之时产生的《庄子·天下篇》，堪称这方面最早的范例。

20世纪中国学术史的奠基人，应推章太炎与梁启超。章太炎于这方面发轫较早，有关论作虽多，但未成专著。梁启超则在20年代先后撰成《清代学术概论》及《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在后一书开首，梁启超说：“这部讲义，是要说明清朝一代学术变迁之大势及其在文化上所贡献的分量和价值。为什么题目不叫作清代学术呢？因为晚明的二十多年，已经开清学的先河，民国的十来年，也可以算清学的结束和蜕化。把最近三百年认作学术史上一个时代的单位，似还适当，所以定名为《近三百年学术史》。”后来钱穆先生1937年出版的书，尽管学术观点与梁氏不同，也用了同样的标题。

梁、钱两书都有相当重大的影响，我认为这主要是因为其所讲述的学术史，对当时学术界而言恰好符合需要。任何一个历史时期的学术，总是以前一时期的学术作为凭借的思想资料，从而有所变革、进步和创新。足知对前一时期学术史的了解，一定会有利于当代学术的前进，甚至应该说是促进学术新发展的必要条件。就梁启超到钱穆那个时代的学者而言，他们面对的问题与挑战，究其渊源，大都可上溯到清代前后的三百年，无怪乎《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两种都不胫而走了。

今天的学人，所处时代已与梁、钱二氏不同。作为我们学术界先行和凭借的，不是清代，而是落幕未久的20世纪。比之清代，20世纪的历史更是风云变幻、波澜壮阔，人物更是群星灿烂、英杰辈出，为学术史的研究提供了十分辽阔的用武之地。为了看清当前学术文化的走向，推动新世纪学术文化的建设，不能不重视对20世纪学术的研究。这正是我近些年一直呼吁加强这一时期学术史工作的原因。

实际上，对20世纪学术的探讨研究，早已在很多学者的倡导支持之下展开了。在这里我想强调的是，这方面的工作还有必要在深度和广度上继续扩展，特别是我们考察20世纪的学术文化，眼界还有必要进一步拓宽。

20世纪的中国学术极其丰富多彩，不能只局限于一时一地，例如北京、上海的几处大学和机构。应该说，由于时势机运的流转变迁，很多地方在学术上曾形成学科或思潮的中心，那里的学者在多方面都做出了独特的成果和贡献。

四川就是这样。自古以来，蜀学有其脉络，虽说蜀道甚难，但蜀地学人影响被于天下。晚清以至民初，情形更是如此。特别是抗日战争爆发之后，学人云集，蔚为盛况，于四川文化发展开前所未有的局面。仔细探究四川的学术史传统，是非常有意义的工作。

“大家学术”丛书即是如此规划的。这套丛书第一辑即专门编选四川地区卓有建树的学人著作，加以介绍其思想成就的前言，便于读者阅读。现在第一辑所收作者，都是中国学术界公认的著名学者，无愧“大家”称号。他们大多著作等身，非短时间所能通览。这些选本足以帮助大家了解他们的学术概要，相信一定会受到欢迎。

这套丛书还将继续编印下去，分辑搜集、编辑全国各地 20 世纪著名学术大家的专题学术论著精粹，使之成为较为全面反映中国 20 世纪学术文化发展成就的窗口。

最后，希望四川学术界当前以 20 世纪学者为主，为撰著系统的 20 世纪四川的学术史做出准备，将来还可上溯到更早以至古代的蜀地学术，对中国传统文化研究的贡献就更大了。

于北京清华园

序

张子开

项楚（1940—），祖籍浙江永嘉县，出生于湖北老河口市。1957年毕业于南昌二中。1962年毕业于南开大学中文系，随即考取四川大学中文系研究生，师从庞石帚教授。“文革”中，被分配到某军垦农场劳动两年，旋又在成都西北中学工作十年。1976年被借调到《汉语大字典》编写组。1980年调入四川大学中文系，因成就突出，从没有任何职称的教师直接升为教授。1990年被国务院评定为博士生导师。同年，以他为学术带头人的团队申请到“中国古典文献学”博士点，2000年申请到教育部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四川大学中国俗文化研究所），2001年文献学学科被评为国家重点学科。

项楚先生现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成员，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副会长，四川大学中国俗文化研究所所长、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中国古典文献学、中国古代文学、汉语言文字学等三个学科的学术带头人暨博士生导师。

作为国际著名敦煌学家、中国著名文献学家、语言学家和文学史家，项楚教授与敦煌学结缘，始于参编《汉语大字典》期间，

序

001

当时他负责从《敦煌变文集》中摘取例句。为了攻克俗字、口语词汇、历史背景和思想观念这三大阅读敦煌写本的障碍，他逐字逐句地通读了若干部篇幅浩繁的大书，诸如佛教文献（以数年之功通读《大正藏》的经历早已成为学坛佳话）、五代以前的正史、经部和子部的许多著作（《太平御览》《太平广记》等）、集部的《全唐诗》和大量笔记小说，旁及了别的杂著乃至某些比较偏僻的著作，从而打下了深广而扎实的学术基础。此外，他还因其他因缘在敦煌地区居住了一段时间，得以了解当地的民风民俗。

项楚先生曾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敦煌变文研究”“唐代白话诗派研究”，教育部博士点基金项目“唐代白话文学研究”“寒山子研究”，教育部基地重大项目“中国俗文学分体研究”等。在敦煌学方面的代表作有：《敦煌变文选注》（巴蜀书社 1990）、《敦煌文学丛考》（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1）、《王梵志诗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1）、《敦煌诗歌导论》（新文丰出版公司 1993；修订本，巴蜀书社 2001）、《〈敦煌歌辞总编〉匡补》（新文丰出版公司 1995；修订本，巴蜀书社 2000）、《敦煌变文选注（增订本）》（中华书局 2006）。获得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年语言学家奖金一等奖（《〈王梵志诗校辑〉匡补》等四篇论文，1985）、国家教委首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敦煌文学丛考》，1995）、教育部第二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王梵志诗校注》，1998）。

项楚先生研究领域以敦煌学为核心，成果享誉国际学术界，特别是在敦煌变文、敦煌语言文学等方面，上追以王国维、陈寅恪等为代表的老一代敦煌学者。正是以他为代表的新一代中国学者的共同努力，从根本上改变了“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日本”的面貌，将我国建设成了世界公认的敦煌学研究中心，为祖国争

得了荣誉。其第一部专著《敦煌变文选注》受到包括吕叔湘、潘重规等学坛耆艾的广泛赞誉。日本著名的汉学权威入矢义高评价《敦煌文学丛考》道：“本书是由国际著名的项楚氏所著的、集其多年敦煌文学研究精粹之大成的著作……对其渊博深厚的学养及不知倦怠的猛烈钻研精神，我唯有钦佩、叹服之份。目前在此领域堪与项氏匹敌的，恐怕唯有美国的 Victor H. Mair 氏了。”《王梵志诗校注》被公认为是国内外所有王梵志诗研究著作中校订最精审、开掘最深邃、内容最丰富的，成为国际敦煌学界的一部名作。入矢义高说：“对其极周详精审之至的注释，我只能起久长的惊叹之感。”日本佛教大学教授中原健二评价道：“不能不使人为作者的广收博引而瞠目结舌。”

项楚先生的研究领域涵盖了语言学、文学、文献学和佛学等诸多方面，如对唐五代俗语词的研究成就突出，将研究范围扩展到寒山诗等唐代通俗文学作品，恰当地解释了许多字书中不载而又难于索解的疑难口语语汇；对包括敦煌文献在内的唐五代文献的校勘和整理，淋漓尽致地展现了炉火纯青的文献学修养；开创了系统而大量地运用佛教文献进行中国语言文学研究，特别是中古汉语研究的先河，堪称将佛学材料运用于其他学科领域里的典范；开创了俗文化研究的崭新领域，直追并超越了海外的研究水准，改变了我国学术领域中忽视俗文化这一局面，成为中国俗文化研究的领头人。其《寒山诗注》获得四川省政府第十届社科奖一等奖（2003），《唐代白话诗派研究》获得四川省政府第十二届社科奖一等奖（2006）。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梅维恒（Victor H. Mair）评论道，项楚是研究中国传统文献的大师，“利用大量传统原始材料的能力给人以非常深刻的印象，他还有复原导致异说的晦涩文本的超人才华”。

总之，项楚教授性格平淡而思想敏锐，潜心古文献而兴趣广泛，极为勤奋而热爱生活，人品广受赞誉，无愧为一位真正的睿智者。在科研方面，他具有深厚的国学根底，熟读佛经和四部典籍，学风严谨，精于校勘考据，擅长融会贯通，在研究中熔语言、文学、宗教学于一炉，从而形成了独具的治学特色。

目 录

001	序
001	敦煌文学杂考
024	《维摩碎金》探索
039	敦煌变文字义析疑
062	令章大师李稍云
067	《庐山远公话》新校
088	王梵志诗论
130	《王梵志诗校辑》匡补
175	王梵志诗释词
192	《敦煌歌辞总编》佛教歌辞匡补举例
223	《老子化胡经·玄歌》考校

敦煌文学杂考

释亡名与敦煌文学

敦煌写卷伯 3814 号，写有白话五言诗若干首，未署作者姓名，目前学术界公认是王梵志诗。其中有如下一首（亦见伯 3724 号）：

前死未长别，后来亦非久。

新坟影旧冢，相续似鱼鲙（鳞）。

义绌（陵）秋（秋）节远，会逢几个春。

万劫同今日，一种化微尘。

定知见土里，还待（得）旧时人。

频口（开）积代骨，为坑埋我身。

乍睹此诗，似曾相识。原来在《广弘明集》卷三〇下，收录周释亡名创作的宗教诗若干首，其中有一首《五盛阴》：

先去非长别，后来非久亲。

新坟将旧家（冢），相次似鱼鳞。

茂陵谁辨汉，骊山讵识秦。

千年与昨日，一种并成尘。

定知今世土，还是昔时人。

焉能取他骨，复持埋我身。

两相比较，不难发现，所谓王梵志诗，乃是释亡名《五盛阴》的改写，只不过更换了个别字句而已。梵志诗第二句“后来亦非久”失韵，亦当依《五盛阴》作“后来非久亲”，“久亲”与上句“长别”正好为对。值得注意的是，在我们发现这首诗作是《五盛阴》的改写之前，竟完全没有感到它和这个诗卷的其他诗作有什么不同。换句话说，它和这个诗卷的其他诗作，在风格上如此一致。这一事实，难道还不值得我们在探讨王梵志诗的渊源时，深长以思吗？

《敦煌变文集》卷四《太子成道经》（伯2999号），记太子四门游观，于西门见一病儿，有诗一首：

拔剑平四海，横戈敌万夫。

一朝床上卧，还要两人扶。

此诗又见《变文集》同卷《八相变》（北京云字24号），个别字眼不同：

拔剑平四海，横戈敌万夫。

一朝床枕上，起卧要人扶。

何以两诗相似如此呢？因为它们有着共同的来源。《广弘明集》卷三〇下，还载有释亡名的《五苦诗》五首，其中《病苦》一首云：

拔剑平四海，横戈敌万夫。

一朝床枕上，回转要人扶。

壮色随肌减，呻吟与痛俱。

绮罗虽满目，愁看独向隅。

此诗前四句两次被变文袭用，联系《五盛阴》被改写为王梵志诗，可见释亡名作品对敦煌俗文学的广泛影响了。

释亡名何许人也？《续高僧传》卷七有《周渭滨沙门释亡名传》。他俗姓宗氏，南郡人，本名阙殆。世袭衣冠，称为望族。曾事梁元帝，深见礼待，有制新文，帝多称述。其《宝人铭》自叙曰：“余十五而尚属文，三十而重势位。”梁亡后出家为僧，著有《至道论》《淳德论》《遣执论》《去是非论》《影喻论》《修空论》《不杀论》。文多清素，语恒劝善，存质去华，不存粉墨，有集十卷，盛重于世。有弟子僧琨，每临水映竹，体物赋诗，有篇什云。总之，亡名出身于南朝士族，具有高度的传统文化修养。但早期的创作受到梁元帝的称述，自然是属于南朝士族浮靡文学的范畴。剧烈的世变使他遁入空门。他后期的宗教诗将外来的佛教义理与汉族固有的五言诗形式融汇在一起，对后来僧人的诗歌创作产生了影响，而他的弟子僧琨体物赋诗，可谓继承了师风。王梵志白话诗正是在这一点上接受了释亡名宗教诗的影响。他的不少以佛教道理为内容的诗作，继承并发展了僧人宗教诗的传统。可惜这一点还没有引起某些探讨王梵志诗歌渊源的学者的高度重视，所以我愿意在这里特别地提出来。

敦煌俗文学中所见僧人诗歌的影响不限于释亡名。上引《太子成道经》（伯 2999 号）写太子南门行游，遇见老人，老人答言：

眼暗都缘不弁（辨）色，耳聋万语不闻声。

欲行三里二里时，四回五回头歌吟。

少年莫笑（笑）老人频，老人不夸少年春。

此老老人不将去，此老还留与后人。

这里应该包含了两首七言四句诗（偈）。第一首末句“四回五回头歌吟”费解，当据乙卷（斯 2682）和庚卷（北京潜字 80 号）作“虽是四回五回歌”，“虽”与“须”同音通用。原卷“吟”字当提至下首之上，乃是标明下首吟唱声腔的用字（此卷唱词上往往标有“吟”字）。“头”字是“须”字的形讹，盖书手写就“四回五回”四字之后，始发觉漏书“须是”二字，乃补写于“四回五回”之下，由于注意力分散，“须”字误作“头”字，又漏写“是”字，并把下首声腔标字“吟”误连于此句之下，遂成为“四回五回头歌吟”了。此诗又见于《八相变》（北京云字 24 号），末句正作“虽（须）是四回五回歌”。两种变文都采用了这首诗，可见它也是相当流行的。而《全唐诗》卷八二五载唐末匡庐僧隐峦《逢老人》一首：

路逢一老翁，两发如霜雪。

一里二里行，四回五回歌。

此诗后二句与前引变文唱词的相似是一目了然的。但隐峦未必就是原作者，大约他也和变文作者一样，不过是沿用了流行于禅林

中的成句敷衍而成，而真正的原作者却不可考了。

“但存方寸地，留与子孙耕”考

“但存方寸地，留与子孙耕。”这两句诗在宋代流行极广。它的作者是谁？说法极为纷纭。归纳起来，大约有五种：

一、贺水部作。

《全唐诗》卷七九五录此二句，作者题为“贺公”，注“石晋兵部”。按“兵部”当是“水部”之误。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五八、阮阅《诗话总龟》前集卷十九引《王直方诗话》皆作“贺水部”。《总龟》较详，兹引于下：

张嘉甫云：余少年见人诵一诗，所谓“但存方寸地，留与子孙耕”。不知何人语。元符三年过毗陵汪迪家，出所藏水部贺公手书，乃知此诗贺所作，世俗以为他人，非也。贺天圣中为郎，真宗东封，谒于道左。元佑初，其二弟（按：“弟”下夺“子”字）逾（按当作“喻”）、乔者来京师，云贺尝于泰山望见东坡，意甚喜之，欲上元至龟、蒙，东坡为作诗，亦赋五篇。余爱嘉甫一章云：“方寸平田便有余，子孙无复废耕锄。已将不死为嘉种，更向无何筑隐居。”（《直方诗话》）

这里提到苏轼（东坡）为贺水部作诗事，《东坡前集》卷十七有《送乔全寄贺君六首》，诗序记其事颇详：